

论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特质

王仕民

(中山大学 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作者简介] 王仕民(1963-), 男, 湖北云梦人,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德育、德育文化研究。

[摘要] 中华民族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是在一定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上, 由各种因素的交融渗透、经世代的积淀和选择而成, 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质。这些特质厚实而凝重, 形成了我们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正是保留了这些历史特质的合理内核, 才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并再造辉煌。

[关键词] 中华民族精神; 历史特质; 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 B2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0711-05

一定时代的民族精神, 归根到底是该时代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这个过程既体现了民族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又作为民族历史形象的直观图像, 内化为特定的民族精神, 进而上升为影响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第585页)中华民族精神的产生和发展也不例外, 它是在一定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上, 由各种因素的交融渗透、经世代的积淀和选择而成, 表现出鲜明的历史特质。研究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特质, 有利于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一、注重实际、积极入世的态度

长期的农耕生产, 使中华民族积淀了深厚的农业文明, 其本质是土地文化。生产劳动以土地为轴心无求于市场, 私有财富以土地的多寡来衡量, 阶级的划分以土地有无来确定。依赖土地而生活是农业文明熏陶下中国人唯一可信赖的生活方式, 视农耕为财富的根本来源, 弃农经商是歪门邪道, 工艺技术是“雕虫小技”。所有这些构成了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大陆性民族重土避迁、平安求稳的文化心理。章太炎在他的《驳建立孔教义》中说:“国民常性, 所察在政事日事, 所务在工商耕稼, 志尽于有生, 语绝于无验”。他的这段论述, 就深刻地阐明了以农业为主体的中国人“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

中国古代的民族精神蕴含着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 无论是爱国精神、重德精神、自强精神、整体精神, 还是和合精神, 均重视实际、关注现实、讲求实用、追求事功, 轻浮华、贬空谈、鄙玄虚, 表现出黜玄想而务实际的历史特质。所谓“华而不实, 耻也”。“大人不华, 君子务实”。相对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天学”的主体思想, 印度佛教文化“鬼学”的主体思想, 注重实际、积极入世的“人学”, 是以儒道法三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精神的共同认知。就儒家文化而言, 不论是先秦的孔孟荀卿之学, 还是两汉以后的儒学, 其主导思想都是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化民俗的。孔子仁学思想的实质就是对人的发现, 以及对人的价值

的肯定。而“内圣外王”，“修齐治平”，“要言妙道不离人伦万物”，正是儒家学派所推崇的主要信条。他们追求“正德、利用、厚生”，力求将内在的思想外化为积极的事功。法家文化以奖励耕战而著称，重视社会治理，一切以功利和实效为依归，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道家文化，看似玄虚奥秘，其实质仍然着重于聚积自身的力量，以“无为”达到“无不为”。

因此，在中国古代每一个从乱世向治世转化的时代，黄老哲学都发挥了其特殊的作用。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以及无神论的传统，促成了中华民族这一人生观的形成和发展。和西方、印度紧紧盯着彼岸世界的文化相比，中国数千年来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抑制了宗教的泛滥，宗教势力相对薄弱，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将文化投向现实世界，着眼于“今生”，而不是“来世”。中国人致力于入世，不讲求出世；重视道德，轻视宗教；崇尚经验，无视鬼神；尊崇王权，压抑神权。尽管中国也有土生土长和外来的宗教流传，却始终未能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禅宗，最终也转向对现实世界的瞩目，使精神的领悟和解脱融化在日常琐碎的生活中，并与小农经济相结合，确定了所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生活准则，推崇“触类是道”、“平常心是道”、“即事而真”的思想，主张行、住、坐、卧、劈柴、打水都是“妙道”，提倡不脱离日常行事，从各种事物的现象中体悟佛道。关于价值的源头，西方人将其归结为“上帝”，中国人将其归结为“天”。西方的上帝是完全超脱的神，而中国的“天”则是超脱和内在的统一体。《中庸》中的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在中国人看来，“天道与人的‘心’和‘性’是一回事，仅仅它们处在不同的位置上而有不同的表述。这种‘天人合一’的价值源头，使古代的中华民族精神在追求‘天理’时不离‘人伦是用’，在‘人伦是用’之中又须臾不离‘天理’”。也正是因为这种“即世间而出世间”的人生态度，使中国古代的民族精神立足于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没有像西方和印度那样产生宗教的意识与彼岸的观念，不会因为一种彼岸的幸福和解脱，去专门过一种宗教徒的生活。

一般而言，中国人习惯于把崇高的信仰和理想，与平凡的工作和事业联系起来，把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寓于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之中，脚踏实地地做好人和事，努力使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具有永恒的意义，不幻想在“天堂”和“来世”中得到永生和幸福。在中国人看来，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平凡的事业中，将自己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永恒的事业，这本身就赋予了短暂的生命于无限的意义。

二、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

受宗法氛围影响的古代中华民族精神，表现出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属于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型”文化，这一特质与西方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颇有差异。中国古代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由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加工和改造，更加理论化、固定化和系统化，它所铸造的完整的宗法意识、宗法血亲的遗风和长期延续，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历代中国学者谈天说地论人，均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赞美人的伟大，是世界的主宰。传统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规范和调整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维系着社会统治秩序，渗透并贯穿于民族成员个体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历史观乃至整个思想认知之中。伦理本位主义，造就了古代中华民族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虽几经流变跌宕，却绵延不绝，世代传承。受其影响，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各个要素，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体系，始终围绕着人的人生目标和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展开。

关于伦理和道德，《易经》最先出现“人文”一词，含有教化风化之意，显露出人伦至上、伦理经世的理念。所谓“人文”就是伦理道德秩序，是圣人教化民众的思想武器，是使人循礼守俗的内在依据。以“三纲”、“八目”为人生哲学的儒家修养理论和认识，以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完善为宗旨。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董仲舒对人有善恶之心的强调，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将自然万物以及人类社会统统纳入伦理道德的范畴。在儒家学派的大师们看来，世界秩序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秩序，道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人人都有道德的意识，人的道德本质是人行善的根源所在，是人的最高理想人格实现的内在基础。所以，道德不仅内在于人的本性，而且具有外在的指向，涵育家庭、社会、国家各个层面。

这种人伦思想也在其他学派中有所体现。例如,道家希望不为境累、不为物役、绝圣弃智、洁身自好,实际是对自由人格的追求,表达对实现个体价值、建立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的向往。佛家宣扬万法皆空,了无自性,慈悲为本,普度众生,劝人为善,并未脱离尘世伦理的框架。法家提倡“人皆以计算之心以相待”,后人称之为“非道德主义”,成为董仲舒所倡导的“三纲”之说的重要来源。

各家学派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最终凝聚成古代民族精神各要素所推崇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对伦理道德的注重不同,西方文化具有理性的科学主义传统,其各门人文科学乃至全部文化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科学的方法。西方文化倡导对自然的研究,主张建立科学的王国,他们颂扬人的理性的力量,坚信只要运用理性的方法便可获得对世界绝对真理的认识和把握。在他们看来,理性是一种认识方式、思维模式,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进行对社会、自然和人生的认识和思考,表现为对思维的逻辑性和科学性的注重,强调对事物作冷静、理论和抽象的把握。

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以人为本位、以法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潮不同,古代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伦理和道德,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中国文化重视人,主要表现在将个体融入至群体之中,强调五伦,强调人对于宗族和国家的义务,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它重视道德的伦理,强调民族成员的角色意识和义务的履行,对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生品德的修炼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儒家所强调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以及“忠恕之道”、“矩之道”、“民胞物与”等观念,突出了人际关系处理时以对方为重的基本原则。它强调个人道德和品质的修养,注重培养健全的人格,认为唯有完美个人的“人格”才有可能推己及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在这一人格观念扩展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民族气节和“国格”得以形成。它用思想和道德的力量,把自然经济条件下,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的松散组织,维系了起来,形成了巨大的民族向心力。古代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华夏苗裔”的观念,曾经一次又一次克服民族分裂的危机,保持了国家的大一统和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

三、注重“中和”的思想特色

中国古代农业文化心态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贵和持中”的思维方式,或曰“中和”的思想方法,亦称“中庸之道”,它早于孔子而出现,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断,以他平他谓之和”,大概就是这种观念的最初表述。后经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执两用中”以及《礼记》、《中庸》的全面总结,“中和”思想遂告形成。“中和”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基本特质,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

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靠天而生存,这种认识的理论抽象就必然是“致中和”的思想方法。同时,它又是理顺兼“天之元子”和“民之父母”双重身份的君主与它的臣民之间关系的推进器。此外,它能有效地解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和家族关系的内部矛盾。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与西方注重冲突和对抗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一差异反映了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区别。

“中和”包含了“中”与“和”这样两层含义。“中”,把握事物度与量的准确性;“和”,不同要素、不同方面的合理组合。“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和”则指多种事物在违背“中庸”的原则基础上的统一。这就是朱熹在《中庸章句集注》中所说的:“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之言,则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在矛盾冲突中,保持和谐的手段是“尚中”,即通过对“尚中”原则的感知和实践,去实现人与人之间、人道与天道之间的和谐,因此“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其核心就是思想行为的适应和守常,反对偏激,以理节情。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又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周易》载“文明以见,中正而应”,“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在此,中正、刚健浑然统一为天然美德,为天地人合一的“道”,反之“重刚而不中”则“上不在天,下

不在地,中不在人”。道家也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中道观,主张小心谨慎,反对盲动冒进,“不为天下先”。

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是一种注重求道的整体思维。在这种思想方法之下,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包括天道、地道和地道在内的宇宙世界是一个整体,包括精神、心理和肉体在内的生命的活动是一个整体,包括情感、理智和意欲在内的精神活动是一个整体,所括思想、行为、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在内的人的活动更是一个整体。

总之,它要求人们在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情感与理智、思与行的对立统一中去把握宇宙的真谛、社会的真理和人生的意义,去追求理想的社会生活和理想的精神境界,去实现人生价值和获取生命的延续,在体道、悟道中得道。“中庸之道是中国自古的文化财富、中国人自古的品格,连同文化积淀一起,在中国民族性底层起作用,成为民族一种微妙的心理力,成为被后人遗漏的自发心理力”^[2](第 311 页)。这种思想既适应了大一统政治要求,又迎合了宗法社会的伦理需要,成为民族情感的共同心理。

“中和”思想强调对立统一、辩证思维,在古代社会曾经促使中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身的协调、天人的协调和人我的协调。中庸本身是对阴阳二极的中正和中和,它贯通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源远流长之中,使中华文化具有超乎寻常的包容性和内聚力,在多种文化融会时,异中求同,万流共包,施之于风俗,便是不偏颇,不怨尤,内外兼顾。夫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则是温良谦和的君子之风。作为普遍的思维原则和心理品质,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使人们注重和谐,维护整体,谦让宽容;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人际关系的和睦,社会的和平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抑制了中国人竞争观念的成长。

四、兼容性与主导性并存

所谓兼容性,是指复合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源与流的多元共生、继承延续和传播吸收,它包括整体民族精神萌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所谓主导性,是指复合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中必有一种居主导地位的文化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所有的选择和排斥功能,包括选择所需养分、排斥不适应因素的内在机制。在复合民族国家中,组成整体的民族精神与各个民族群体的文化精神之间存在着某种相生相克的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与复合民族国家民族结构的特点和内容遥相呼应。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兼容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多元一体民族结构作用的结果。

复合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十分广博的概念,诸多民族文化因素多元交汇,各个民族群体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与整体民族精神的时代特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构成了整体中华民族精神的演进,从而获得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有鉴于民族成员是文化选择的主体,兼容和并蓄、主导和选择便具有了主体能动的作用。在人类实践的过程中,单个民族的创造力总是相对有限的,如果不能从广泛的源与流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造就民族历史的辉煌与凝重。因此,越是伟大的民族,其精神和文化就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涵盖性,所有这些来自于文化上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造就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无论是从广博的内涵特性,还是从辽阔的地域分布,古代中华民族精神都具有深厚和深远的兼容性。中华民族精神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区域性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越、岭南文化的并存,同时又是蒙、藏、回、壮等 50 多个民族的共生创造的。古代中华民族精神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过程。在中华民族千年不衰、交融会通的过程中,汉文化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它是历次民族文化大交融的核心,而且表现在它对各少数民族所具有的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纵观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民族大融合,无论是由汉族政权还是由少数民族政权所领导,或为汉民族注入了新的血液,或为汉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其结果均未能从本质上改变汉民族及其文化的基本格局。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崭露头角的少数民族,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都大量吸收了汉文化,虽自成系统,却都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些文化和系统与汉文化有所排斥,却又紧密相关。这就决定了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民族平等的前提下,各民族文化凝聚成以汉文化为核心的统一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族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汉民族文化亦在历史上大量吸收和涵化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发展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

由此可见,影响主导性的各种因素,从纵向的文化遗产来看,离不开文化传统的承借和发展;就横向的多元交汇而言,离不开文化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准以及同外来文化及异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自身不断发展以及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中发扬光大的。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在吸收和涵化各派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历经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融合和演变,一直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主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点。中国历史上先后有佛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等,这些外来文明虽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但均未能改变中华文化主导地位。兼容和并蓄,主导与选择,造就了古代中华民族顽强的再生能力。

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古老,更在于它在内忧外患之中,一次又一次的辉煌。从“原生文化”到“衍生文化”,以适应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既有一脉相承的基本内涵,又呈现出彼此各异的基本形态。文化发展的连续完整和不断嬗变同在,对于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的形成和完善,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起到了凝聚、认同和融会的作用。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3](第585页)正是这种历史,才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特质。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特质,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正是保留了这种历史特质的合理内核。

[参 考 文 献]

- [1]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沙莲香. 中国民族性:二[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严 真)

On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WANG Shimin

(School of Education,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Biography: WANG Shimin (1963-),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Education, Zhongs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ral education.

Abstract: The orig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are based upon a certain national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composed of various kinds of factors which have been accumulated and chosen from generations and show striking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histo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with rich and profound contents are the soul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is to reserve the reasonable contents of the historic characteristics so that we Chinese nation can stand among the other nations of the world and create its new glory.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historic characteristics; national renaissance